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兰州党史资料汇集

(四)

中共兰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四月

目 录

难忘的岁月·····	樊桂英 (1)
越狱纪实·····	李铁轮 (14)
甘工委破坏后的一段斗争·····	郑重远 (23)
我党领导下的兰州抗日救亡运动·····	马 伟 (29)
怀念罗扬实同志·····	杨献珍 等 (39)

难忘的岁月

樊桂英

光阴流逝，岁月难留，兰州阔别，屈指已三十八年。当年我还是个思想单纯、政治幼稚，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凭着满腔热情，一颗红心干革命，走过漫长坎坷的路程，也遇到过无数艰难波折，不觉渡过几十个春秋。我是革命洪涛中的幸存者，时时记起过去那令人难忘的岁月。

光荣的“禁闭”

早在抗日战争初期，一九三八年五月，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党组，命我去大西北工作。为了途中方便，让我乔装打扮成八路军战士，前往国民党统区大后方——甘肃省兰州市。临行时还携带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一大包文件、刊物和自己的简单行装，行程七百多公里。接近兰州市汽车站遇到国民党宪兵的盘查，幸有两个好心的司机工人支持和协助，所带之物无一损失，较顺利地到达目的地——兰州市内孝友街八路军驻甘办事处。负责人是一个和蔼慈祥的老同志，大家尊称他为“谢老”，是党中央派驻甘肃省的党代表谢觉哉同志。谢老当时已年过半百，鬓发斑白，操一口湖南口音，谈话幽默风趣，令人倍感亲切。我向谢老汇报来意，谢老风趣地问道：

“你是来吃粮当兵，还是要讨个工作做？”接着他又说：“这个地方不象延安共产党是公开的，你这样公开身份出现会给以后工作带

来麻烦的，你准备搞什么工作？”我说：“听从党的安排。”谢老说：“那很好，我先关你一个月‘禁闭’，不要饭钱，也不付店钱行吗？象个闺阁小姐那样不能见人，更不许迈出大门，也不能和对象通信。”我听了后觉得很有意思，也理解到他老人家这些话的含意。我点点头表示服从。后来谢老又悄悄地解释说：“办事处往来的人员很多，很复杂，有好人，也有国民党特务，要注意回避。你以后要搞地方工作，是秘密工作，要特别警惕”。就这样每天遇客人我便躲在小房，真象关了“禁闭”。

办事处人员不多，大都是青壮年同志，工作制度比较严格，但都是自觉遵守。每天清晨作操，上午学习开会，由谢老上党课，讲党史，伍修权处长教授俄语，还有些同志学文化课，有时还有周末晚会，生活紧张而有条理。每逢晚会，我都参加，最喜欢听八路军“小鬼”讲长征故事。同志们一起谈笑歌唱，情绪非常愉快。这里还经常出现经新疆运送军火的苏联来访同志，大家称他们“老毛子”，谈起话来嗓门很高，性格十分开朗、直爽，由伍修权同志接待他们。我虽在蹲“禁闭”，不但不感觉寂寞，反觉得快乐、好奇、有趣。

谢老年龄虽大，但精力充沛，干劲很大。他每天除外出和社会各界人士打交道外，晚间还要在灯下阅读文件，处理公务，写文章，作诗，记日记，总是忙碌不停。他胸襟坦白，待人谦虚，对我们这些年轻同志耐心教育，关怀备至。我们虽然相处只是短短月余，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益，也增长了不少知识。他是我学习的榜样，也是我开始革命生涯时敬爱的师表。

现在回忆起在兰州“八办”一段生活仍倍觉亲切、美好。同志之间团结友好，生活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的气息，那愉快的情景使

人终生难忘。那是一次光荣的“禁闭”。

兰 州 民 先 队 始 末

一九三八年六月初，我走上正式工作岗位，即甘肃省地下工委所属妇女委员会。由刘杰同志负责，我担任组织委员，具体任务是组织妇女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同时深入了解党的组织情况。记得当时有个兰州火柴厂，还有省外留学生抗战团及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等群众组织都有党的支部，也有个别分散机关党员。我们采取单线联系，秘密接头的方法，传达党的指示，反映群众要求。由于党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深得民心，兰州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革命浪潮空前高涨，广大青年进步知识分子积极靠拢在党的周围，八路军办事处成了革命者云集之地。甘肃工委多次在此开秘密会议，听取谢老的报告指示，研究工作问题。除此以外华美照像馆（樊大畏同志家），工委书记孙作宾同志夫妇的住处西城巷，也都是地下党活动的据点。

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恐惧，各地抗日救亡团体的建立，尤其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建立，更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反动当局深知民先队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于是千方百计阴谋摧毁和破坏这个组织，以达到其防共限共的目的。一九三八年秋末，中央为了更广泛深入地开展抗日救亡群众运动，又指令解散民先队组织，以分散目标，避免牺牲，扩大活动范围，所有民先队成员以一般群众身份深入到广大革命团体中去，认为这样更有利于发动群众。工委曾慎重研究任务如何完成，怎样向广大队员解释指示精神，不料首先遇到民先队一些骨干分子的反对。后来在“八办”召开党委会议，参加的人有谢老、罗云鹏同志及积极分子

等。谢老在会议上详述了统战工作的发展，客观形势的变化和工作方法等，并肯定了成绩，指出了方向。有的同志认为，有个先进组织便于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使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发挥有力的助手作用，否则会产生消极因素，打击队员的积极性。他们只看到问题的一方面，对可能发生的危险性缺乏足够的认识。最后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论，大多数同志认识到解散民先队的必要，权衡利弊，认清形势，搞通了思想，才贯彻了上级指示，但仍有个别骨干分子自由成性，缺乏组织观念，竟然自行脱离党的领导，远走外地他乡。罗云鹏同志事后说过，在复杂的现实斗争中，革命阵营内部难免出现各种矛盾，产生自由主义现象，甚至出现逃兵，这也是难免的。我们必须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做到仁至义尽。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我们要永远保持和发扬这个优良传统。

夫妻·同志·战友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蒋介石迫于形势压力，不得已同共产党实现了国共合作，全国统一战线逐步形成。甘肃省地处偏僻大西北，政治形势比较落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期间在大的革命浪潮冲击下，有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正确路线领导，兰州经谢老等一些老革命前辈的直接领导，以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和顽强的毅力，使西北地区的统战工作取得重大的进展。然而反动派顽固势力却恨得要死，怕的要命，唯恐动摇了他们的反动统治，从没有停止过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甘肃党的组织始终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进行活动。

甘工委负责同志罗云鹏从一九三八年春派到兰州后积极工作，

拼力活动，对发展巩固党的各级组织做出不少成绩。而他在个人生活方面却是十分艰苦，又无正式职业作掩护，最初他隐居在市委罗沔同志家里，为了不引起邻居怀疑和应付保甲人员盘查，化名罗平，和罗沔同志兄弟相称。他平日早出晚归，生活比较困苦，吃饭无定时，常在外“打游击”，随时随地要警惕特务追踪，不谨慎就会遭到意外。谢老和工委负责同志对他的处境非常关注，研究让我和他组织个家庭。这样做是革命的需要，便于掩护地下党组织，彼此又能互相照顾。我和罗过去并不相识，只是我在“八办”开会时见过面，他的一切情况我一无所知。党对我的这个意外的建议，我一时难以接受。那时我是一个单身青年，一身轻装，刚踏上工作岗位，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婚姻家庭问题，因此感到忧虑和不安。我经过反复考虑，认为双方都是党员，有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在党的光荣事业的基础上，和客观因素的促使下，我接受了组织的建议，和罗云鹏同志秘密结为伴侣。经过一段共同生活产生了感情，而且这样的感情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我俩是夫妻更是同志，在日常生活中，总是把党的利益放在首位。这是共产党人应遵守的党性原则，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破坏的。

由工委秘书赵子明同志一手安排，我们住在黄家园一家卖油条的后隔壁。这是一间简陋的小屋，光线不足，有时天阴下雨还需点煤油灯工作。从此这间小屋便成为工委活动据点之一，开会、学习、研究工作也多在这里集聚。老罗常说，我们的屋子虽窄又黑，它却蕴藏着巨大的光辉。

罗云鹏同志生活方面非常简朴，注意节约一支蜡烛，一张纸都不轻易浪费，他在这里写下了不少文稿和工作计划等等，后来因为形势险恶，这些手稿都被烧毁，现在想起，十分遗憾。

黄家园住处与赵子明同志家相距很近。他的豆浆店就是党的秘密联络地点，对工委的交通联络提供很大的方便。豆浆店两位伙计（党员）经常传递文件，做了大量工作。我们和赵的关系非常亲密，彼此之间情同手足，相处十分融洽，宛如一家人，赵大嫂亲切的称老罗为：“大兄弟”，对我们关怀备至。这样的阶级友情，永远不会从记忆中消失。

一九三九年初，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央指示各地党组织要提高警惕加强戒备，防患于未然，工委决定分散隐蔽。我和罗云鹏同志于一九四〇年三月离开兰州到天水，只留孙作宾同志和王实先同志在兰州主持工委工作。四月初，孙奉命调回延安，我们又返回兰州，由罗云鹏同志负责主持工委工作。赵子明同志替我们安排了另一个住处——位于兰州东城郊区小稍门外约二三里远的周家庄。房东老汉名席维汉，是个老实农民。从此工委机关便固定在这里。我的工作就是以家庭主妇面目出现，搞工委日常具体事务如书写、刻板、文印等。罗云鹏同志整天出外奔走，多以口头传达为主要方法，与各地党组织联系。为了有个公开的职业做掩护，和房东老汉合办了石灰窑厂，当时只是在筹备阶段，并未正式开工。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刚生了孩子，尚未满月。十月，中央西北委员会通知罗去延安汇报工作。那时正值日寇飞机疯狂轰炸兰州，又加上漫天大雪，百姓不能动烟火，怕日机发现目标。连续几天日夜不解警报。我怀抱刚满月的小莉莉只好白天蹲在野外积雪覆盖的土沟坑里，晚间才能回家。因为不能生火做饭，只好啃干饼子，喝生水，心中十分焦急，唯恐家中万一被劫造成工委难以想象的损失。幸有王实先同志（化名罗云鹭，对外称罗的胞弟）每天都来探望，并帮助料理一些家务，这才使工委机关未遭到

任何损失。月余后，罗安全返回兰州，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总结一年来工委工作的经验教训，肯定成绩，指出错误，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销毁了一些可能暴露的文件、表格等。对一些知名人士、上层人物中的组织发展更加慎重考虑，提高警惕，对过去发展的一些党员中尚未彻底审查清楚，值得怀疑者一律重新加以安排处理。

一九四〇年元月党中央派李铁轮（化名李云章陕西汉中人）和他的爱人鲁平（山东人）同志到兰州工委工作。李担任工委书记。大家非常高兴，欢迎新的战友。

李铁轮同志到兰州后，根据当时的情况和罗云鹏、王实先等同志一起，研究工委工作计划，拟定工作提纲（包括发展统一战线、巩固党的组织、保守党的机密、如何继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民族工作及文化工作等）。

一九四〇年春季，国内政治形势更加紧张。国民党反动当局，加强白色恐怖，在作战前方不断制造磨擦事件，在后方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解散革命群众组织，禁发进步刊物。面对严峻现实，甘工委立即准备转移。同时接上级指示：工委成员中有可能暴露者调回延安学习。当时便决定罗云鹏、郑重远和我一起返延。为了进一步贯彻中央指示，部署以后工作，决定在周家庄召开工委全体会议。会议决定在我们三人离兰后工委工作由李铁轮同志负责。谁料会议前一天——一九四〇年六月六日工委突然遭到破坏。郑重远、王实先因故尚未赶来参加会议，才得幸免这场灾难，险些儿被一网打尽。

在 狱 中

六月六日凌晨二时，兰州伪警察局派一名户籍人员和三名警务

人员突然闯进院中进行盘查，看有无未报户口的闲人。凑巧李铁轮、小李子（惠光前化名林亦青是工委搞青运工作的）因天晚路远未及返回，临时留住这里，引起怀疑，故同罗一起当场都被抓走。天亮八时，我借送饭去伪警察第四分局探听消息，看敌人对他三人看管很严，连接见也有人监视，便感到事态严重，回来马上着手毁烧一切可疑东西。七日黄昏由伪警巡官金某带领多人进行搜查。紧接着第二天晨七时，又有大批伪警，包围了工委所在地，气氛异常紧急。当日下午三时我也被捕了，怀中还抱着八个月的婴儿莉莉。后来又株连到赵子明同志和房东席维汉。从此我们失掉自由，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阶下囚。

房东老汉是个老实农民，家境贫穷。我们相处一年多，彼此互相帮助，关系甚好。他在受审时，没有供出什么有关线索，数日后被保释放。

随着事态的发展变化，相继又有人被捕叛变，加上敌人搜查到一些物品，案情更复杂化，估计释放没有可能。同志们已做了坐穿牢底的思想准备，决心在任何艰苦困难的情况下都严守党的机密，再也不能给党造成破坏和损失。

一九四〇年七、八、九月间是关键得非常时期。我们被转押到伪警第一分局拘留所，开始了最艰苦的战斗历程。敌人加紧了残酷的刑讯，起初他们故意以汉奸罪名来逼供。罗云鹏以共产党员的公开身份，针锋相对，据理力争。他无情揭露敌特假抗日真反共的丑恶面目，痛斥这群家伙对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义的无耻背叛，诬陷真正的抗日爱国人士。问得敌特哑口无言，十分尴尬。八战区特务头子朱某和曾在德国法西斯受过专门训练的伪警第一分局局长王某恼羞成怒，命令那些恶狗般的走卒打手施以大刑，什么老虎凳，压

杠子，悬梁吊打等等，肉刑无所不用。罗被打得昏了过去，又用冷水浇醒，不知多少次。然而这些酷刑并没有丝毫动摇钢铁战士的坚强意志。最后敌人以死来威胁让罗签字，罗态度自若，毫无畏惧，手执狼毫签了字，弄得敌人非常狼狈；只得暂停审讯，退堂了事。敌人的刑具非但吓不倒我们，更未能取得他们所幻想的东西。在三个月的残酷审讯中，我们都动了肉刑，被打得皮开肉绽，难以活动。大家满腔怒火，愤慨万分，坚信总有一天要报仇雪恨的。

六月大暑天，气候炎热。同志们身受酷刑，夜间又有跳蚤、臭虫、毒虫袭击，小莉莉被叮得全身是疮，痛痒难忍。由于我的身体受伤，精神紧张，奶也没有了，孩子哭啼不止，想不到她来到人间不满周岁，竟遭到如此摧残，何罪之有？回想当时情景，不由心酸流泪。同志们团结一致，互相关心，生死与共，同舟共济。赵子明同志悄悄地托人买了些药膏设法转给同志们医治创伤，准备接受更加艰苦的战斗。

不久，林亦青同志越狱未成，引起特务气恨，毒打一顿又严加看管。半月后，我们又被转押至郊外沈家坡警察总局看守所。他们把罗、赵、林、李集中在一个大号子，我被押在女监。这时候敌人用软硬兼施的手段施行“感化”，其结果枉费心机，一无所用。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发生，全国形势紧迫。鉴于前些时看守所有些刑事犯逃走的先例，大家认为逃走也有可能，否则一旦被分开管押，错过机会，困难更大，于是他们四人便酝酿越狱。经过周密精心的研究安排后，首先用些贿赂麻痹看守，同时设法找到了炉条慢慢地把牢房后面的木板墙，烧开了个小洞。一九四一年农历正月初五日午夜，乘着看守正在春节狂欢之际，一齐出了狱，分两路逃走。不料偏偏碰上敌人的巡逻队，打乱了原来的部署，彼此

分散各行其路，结果赵子明与李铁轮同志脱险分头到达延安；罗云鹏和林亦青同志因地形不熟再次被抓回。那时我被押在女监，无越狱可能，但也受到更严格的看管，上厕所也有人持枪在监视，真是寸步难行。从此互相隔绝。我们和外边党组织也断了联系。

真是祸不单行。一天，我心情焦虑，夜间小莉莉从高土炕上颠倒跌下，头部震荡，两天昏迷不醒，奄奄一息，无药又无医，只能听天由命，那凄惨景象，令人触目心碎。说来也奇怪，第三天她又缓过来了。俗语道：“天无绝人之路”，倒也有点“神奇”。

沈家坡越狱，惊骇了敌特分子，他们加紧防危，唯恐再出问题。半月后又把我们四人转押到甘肃省第二模范监狱。一个月后又被转送到黄河以北离城较远的大沙沟监狱。这是新开辟的一座政治犯监牢，由甘肃伪党部调查统计室特务看守。

日光如流，转眼落入魔窟已经一年多。自从越狱不成后，罗云鹏同志倍受折磨，身染重病，带上二十四斤的大号脚镣，临送沙沟监狱时方才取了刑具，但他步行艰难，动弹不得。由于我的坚决要求，看守允许我们同林亦青同志关在第二个“大号”。这时候小莉莉已经一岁多，长得头大身瘦，走路摇摇晃晃。罗从此就给她改名为罗力立（意为有力量的站起来），外号叫大头，大家都唤她“大头”，有个“大”字她以为荣，换个“小”她还不行。

这期间罗的病渐渐好转，身体虽然瘦弱，意志更是钢毅。他对同志说：“先烈有一句豪迈的名言：生为人杰，死为鬼雄，我个人并无流芳千古之意，但绝不能做遗臭万年的叛徒。”又说：“司马迁曾说过：人固有一死，有重如泰山，有轻如鸿毛，我们要永远保持共产党员的纯洁忠贞。我受党的培养十二年，虽未为党做出多大贡献，但忠心耿耿，扪心无愧，把全部的精力用于壮丽的人类事

业。”他的这番话至今还萦绕在我的耳边，铭刻我的心中。

我们在沙沟又渡过几个严冬。同志们顽强地活下来了，“大头”也慢慢长大懂事，天真活泼，聪明喜人，她蹦蹦跳跳，说说闹闹，给沉寂的牢狱增添了生机。难友丛德滋曾说过，“她是黑暗中的一线光明。”她同大号中难友们一起玩耍学写字，学画画，爱唱歌，认识不少单字，有时她有意思的考考大人（有几位红军战士是文盲，也学认字）。这个小人的生命力很强，在监狱中患过麻疹、肠炎、中耳炎等疾病，得不到治疗，险些脱离人世，蒙“上帝”保佑，一次次脱险，现在已成长为壮年。

在狱中以罗云鹏为首，形成党的领导核心。我们成立了秘密支部继续进行工作，研究分析监狱具体情况，摸清敌我的底子，认为有两种不同因素，即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一方面这里关押的绝大部分是受国民党迫害的各界人士，人数不上一百，各行各业都有，总的来说都是反对或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不满，在政治方面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容易接受革命影响能够团结在党的周围，只有极个别民族败类和无耻叛徒混在“犯人”中。另方面看守人员都是受过专门特务训练的走狗，比较难以对付。我们的方针是：支持先进，团结中间（只要不反对共产党都是争取的对象），孤立少数坏人。但方法要巧妙，行动要机敏。对那些下级走卒不必轻意惹动他们，避免因小失大，遭受无谓的损失。我们的斗争目标首先是改善难友们的生活问题。因为当时的条件很恶劣，牢房阴暗潮湿，夏季里跳蚤、臭虫、苍蝇孳生，难友们无一不生虱子，冬季衣服单薄被褥破烂，经常吃不饱饭，没有水喝，冻伤饿死者有之。林亦青同志建议开展绝食斗争，罗云鹏同志考虑到这样做正合敌意，他们恨不得“政治犯人”不杀自灭，对外尚有借口（当时统一战线还未完全破裂），绝食

结果得不偿失，更毁坏难友们的健康，最后决定还是说理斗争。大家团结起来，由老罗出面向特务提出改善生活的条件：①增加口粮、油盐等，②改善卫生条件，延长放风时间，买药医治疾病，增设洗衣、理发、缝补衣服设施，③增添文化生活，看书，看报，会见家属等。一次，军统特务头子陈国英到沙沟“视察”，罗当面和他谈判，陈当时面对现状，无理可辩，只好口头答应，事后大部分条件实现，但绝对不允许会见家属。

难友们为了调剂活跃沉寂、枯燥、单调的狱中生活各个动手用胶泥巴制成各种娱乐器具。如象棋、跳棋，麻将等，特别给“大头”做了不倒翁、小泥娃。节日期间还可以多放时间，大家在号子外边开娱乐小会，“大头”表演拿手节目，歌唱新疆少数民族歌曲《半个月亮爬上来》、《在那遥远的地方》，京剧苏三起解等，惹得大家拍手大笑，异常高兴。年老的难友还教大家打太极拳，做柔软体操，监狱中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气氛。特务们看到大家这种情况，觉得不舒服，表面又不得不伪装笑脸，叫人瞅着可恨又好笑。

失去自由的“政治犯”被特务不当人看，随时随地都遭到虐待和欺凌。出卖灵魂的奸细、叛徒象蛀虫一样，经常钻进“犯人”内部刺探行动。他们为了在主子面前讨好，在难友中挑拨离间，汇报情况，弄得难友无故挨打，“犯人”恨之入骨。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发生了打叛徒的斗争，有个叫赵贤杰的家伙被打得头破血流，喊不成声，大家看了拍手称快，都骂“活该”。一群恶狗气极败坏，把矛头指向老罗，认为他煽动“犯人”闹事，企图越狱逃跑。老罗因此遭到毒打，同时敌人又把我们分关在单人小号隔离起来，不准见面。

一九四三年秋，林亦青同志被折磨成病，不予治疗，病逝于狱

中，年仅二十五岁。林亦青被捕后，坚强不屈，英勇顽强，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难友们都为失去了一位好同志无比沉痛。

一九四六年，重庆谈判破裂。国民党反动派断然撕毁“双十协定”，屠夫民贼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白色恐怖笼罩兰州。特务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青年知识分子最多），沙沟监狱不断抓进许多“犯人”，就连怀胎临产的孕妇也难幸免。

反动当局阴谋制造谣言，散布释放政治犯消息，以蒙蔽群众。谎言欺骗不了革命人民。难友们看穿敌人的假相，暗地里发起不出狱运动，不久特务果然提走了胡润宝同志。事隔两天又要“放”罗云鹏同志，并扬言是共产党提名要的。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五日，罗临刑前隔着牢窗对我说：“我走了！有可能就来接你，望保重。”当时我的心情万分沉痛，不知该说什么，只默然地目送他那高大的背影在阔步移动。他慷慨就义，光荣牺牲了！

罗云鹏同志牺牲时仅三十六岁。他一生为革命，无私无畏，光明磊落，在斗争中从不顾个人安危，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保护同志。他工作认真负责坚持原则，作风民主，尊重领导，遇事从不擅自作主。他对同志谦虚诚恳，很能体贴别人。党信任他，同志们爱戴他。他牺牲在革命胜利前夕，他没有任何个人财产，唯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人们永远前进。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越 狱 纪 实

李 铁 轮

一九四〇年，正当我党领导的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之际，国民党顽固派与卖国贼汪精卫里应外合，极力推行投降路线，掀起反共恶浪，制造磨擦。在这股腥风浊浪之下，甘肃的上空也出现了反共的团团黑云。这年六月六日，甘肃反动当局以查户口为名，逮捕了中共甘肃工委书记李铁轮、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西平（即罗云鹏）、青年委员惠光前（即林亦青），秘书赵子明，以及罗云鹏的爱人樊桂英和他们一岁左右的女孩莉莉等六人。我党在甘肃的领导机关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我们被捕后，起初拘留在兰州城内敌伪警察第一分局，虽经严刑拷打，但大家始终没有屈服。敌人已抓到证据的，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未暴露组织和身份，并理直气壮地斥责国民党反共行为是违背团结抗日精神的。就这样，我们与敌人据理力争，相持数月。在此期间，曾出现过林亦青同志趁机逃跑又被抓回、赵子明同志向外写信被查出的情况。

这年中秋节的前几天，敌伪警察局声称：日机轰炸，城内不安（实为敌人怕日机轰炸时，我们会趁机逃跑）。将我们六人转押到沈家坡拘留所。

沈家坡拘留所，位于兰州古城西南五里之遥的沈家岭山腰。它原是一个庙宇式的建筑物——王家祠堂，后来被国民党甘肃省会警

察局改为拘留所，祠堂正厅和厢房改为牢房，经常关押着普通犯百余人。一九四〇年秋，大概为了特殊需要，把三对山门组织成的前廊又改建成大小两间牢房，关押政治犯。

我们六人被转移到沈家坡拘留所之后，我和张西平、惠光前及赵子明四人被关在那新改建的大间牢房里，樊桂英带着女婴儿住在女犯房间。

我们住的牢房，湿泥墙上麦芽丛生，它与外界严密隔绝。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又与敌人展开了新的斗争。

尽量麻痹敌人 不受敌人麻痹

敌人对待我们是非常冷酷而仇视的。我们被关在这潮湿而阴暗的牢房里，门上挂着沉重的大锁，地下铺些乱草，吃的是麸面糊糊，没有放风时间，不能同普通犯人接触。但我们四人由过去分押而现在变成集押，就得到交流情况的机会，也可以共同研究一些问题，情绪是愉快的。我们在战略上蔑视敌人，下决心做长期、艰苦的殊死斗争。大家共同研究确定了一个策略：坚持原则性，但不采取僵硬的表面对抗态度，尽量麻痹敌人，而不受敌人麻痹；多做看守人员的工作，争取他们瞒上不瞒下，为我创造稍多的方便条件。这种工作多半由赵子明同志出面，因赵子明同志在兰州开豆浆铺，熟人多，交际广，而且颇有办法。

到这里的第二天深夜，发生了一个突然事件：关在厢房的几个河州（临夏）回民普通犯人，他们砸开牢门，夺了警察的枪而逃走。当时吓得管理人员躲在小楼上，看守人员和警察都措手不及。可惜我们事先没有准备，失掉了出狱的机会。回民越狱逃走后，管理、看守人员才出来查看，见我们安睡，没有动静，高兴地说：“幸